

作为“自动图像”的 AIGC： 一个后人类的视角

张宗伟，张诗弩

摘 要：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崛起标志着图像生产从人类中心转向技术驱动范式革命。AIGC 通过算法黑箱与潜空间漫步，将图像生成从人类创作意图中剥离，形成自动化、非人化的“机器语言”。追溯从摄影术到机器视觉的媒介与思想谱系，在后人类的视角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种“自动图像”，AIGC 对主体性、技术伦理和视觉权力都进行了某种重构。AIGC 不仅消解了传统图像的索引性与原真性，而且通过“速度暴力”和“后人类凝视”重塑了感知秩序。在“后人类世”，我们需要重构人机共生的伦理框架，以应对自动化时代的技术僭越与认知贫困化危机。

关键词：AIGC；自动图像；机器视觉；后人类主义；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J9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 (2025) 05-0016-10

作者简介：张宗伟，中国传媒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诗弩，中国传媒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科研助理。北京 100024

doi:10.14003/j.cnki.mzysj.2025.05.2

2024 年的某个清晨，一段由 OpenAI 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 Sora 生成的视频席卷社交网络：暮色中的孤岛上，潮汐以精确的物理规律涌动，一只虚拟海鸥掠过天际，羽翼的每根绒毛都清晰可见。评论区的网友陷入了集体恍惚——“这真的不是实拍吗？”当算法生成的影像足以混淆真伪，当机器凝视悄然渗透人类认知的每个褶皱，我们不得不直面这样的诘问：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以下简称 AIGC）重构视觉秩序的今天，人类究竟仍是图像的“作者”，还是已沦为技术生成的“注释者”？从摄影术的化学显影到神经网络的潜空间漫步，图像的自动化生产早已逾越了工具革新的边界，演变为一场颠覆性的认知革命。AIGC 通过算法黑箱将创作意图解构为概率分布，将艺术家的画笔置换为图形处

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以下简称 GPU）的并行计算。技术不再是人类意志的延伸，而是反向塑造感知与存在的“第三持存”^①（Tertiary Retention）。这场革命不仅关乎技术效率，而且直指人类主体性的存续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自动图像”既是启蒙理性的巅峰之作，也是人文主义的墓志铭。

当自动图像的新质生产横空出世，当机器视觉的算法霸权解构了图像的索引性，当创作主权从人类手中滑向 GPU 的矩阵运算，当机器学会“观看”，人类该如何继续“存在”？视觉权力将如何重新分配？人机共生的伦理框架又该如何重构？这些时代之问亟待思考并尝试予以回答。本文试图爬梳自动图像的思想谱系，从媒介哲学的根系出发，途经后人类主义的理论密林，最终抵达技术伦理的旷野。以后人类为视角，去回应影像技

收稿日期：2025-07-30

基金项目：本文为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电影文化竞争力与海外市场动态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19ZDA27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斯蒂格勒. 意外地哲学思考：与埃利·杜灵访谈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12.

术革命带来的时代之问，并对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的AIGC进行人文反思。

一、从摄影术到机器视觉：自动图像的媒介思想谱系与范式转变

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看来，自然事物的“自动化”并非无目的的随机运动，而是自成一种不受人类意志控制的独立情境系统，其核心特质是“自我运动”。若将这一概念延展到图像领域，自动图像的生成与流变就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图像何以实现自动化？图像作为客观世界的一种表征，承载着人类对视觉的认知与表达。为了厘清自动化在图像生成中的角色，我们不妨先以“自动化”作为主线，观照自动图像的生成流变以及视觉文化研究中对应的理论脉络，以期建构自动图像的媒介谱系学。当然，这一分析也旨在回答本文提出的一个当代问题——为何AIGC影像可以作为一种自动图像？

美国新媒体理论家马诺维奇（Lev Manovich）概括了自动化视觉的三个发展阶段：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对于透视法的发现，到自主运用透视法的摄影术的发明，再到计算机图形学的出现。^①法国哲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透视法相对于其他类型表示法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在物理现实与其呈现形式之间建立了一条“四车道高速公路”；摄影术则实现了人类视觉的机械复制，让“高速公路”可以瞬间成批地垒起；而计算机图形学进一步将这条通道架在了真实与虚拟之间——它摆脱了只能记录“真实”物体的可能性以及对单一透视法的限制。^②同时，在马诺维奇对于新媒体特性的界定当中，自动化连同数值化呈现、模块化、多变性和跨码性是新媒体的五大基本法则。自动化视觉在此处指的是摄影机和计算机模仿人类在其直接环境中对物体视觉体验的能力——

“它们的形状、尺寸、颜色、与镜头的距离”^③。根据马诺维奇的谱系学建构，这与计算机工程师和互联网“鼻祖”罗伯茨（Lawrence Roberts）的研究有关。^④在其20世纪60年代的论文中，罗伯茨阐述了具有识别和理解三维物体能力的机器模型^⑤，并首先在军事装备中实现了这一技术。例如，有侦察和监视测绘数字化地形等功能的军事装备，这标志着第一代自动图像的诞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自动化视觉不仅突破了人类视觉的生理限制，还通过算法实现了图像失真修复与三维形态识别。这种技术进步为自动图像注入了更复杂的结构和功能。

到了新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耦合的当代，自动化视觉已突破传统感知框架，通过监控摄像系统、人工智能虚拟建模等技术重构着视觉感知的边界。从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的人脸识别系统到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病理影像诊断模型，机器视觉不仅服务于军事侦察、医疗诊断与公共安全等实用领域，还以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精度与效率，实现了从“视觉记录”到“视觉解码”的跃迁。在这一进程中，机器视觉的自动化机制已演变为复杂的认知系统——它不再局限于对物理世界的被动映射，而是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对视觉信息进行拓扑重构，最终生成具有自主解释力的视觉图谱。

马诺维奇强调，罗伯茨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奠基性研究具有双重意义：其三维物体识别算法不仅开创了自动化视觉的技术范式，还催生了自动图像生产的全新领域。这一分野揭示出自动化视觉与图像生成之间的辩证关系，前者聚焦机器对视觉信息的解析逻辑，后者关注算法对视觉符号的建构机制，二者的交叉点恰恰映射出控制论、神经科学、机器人学与媒介哲学的多学科融合。后现代技术美学的核心转向在于从“物体生产”到“世界生产”的范式迁移，自动化视觉系统通

① MANOVICH L. Automation of Sight: From Photography to Computer Vision [EB/OL]. (1997-06-01) [2025-07-12]. <https://manovich.net/index.php/projects/automation-of-sight-from-photography-to-computer-vision>.

② LATOUR B. Visualization and Cognition: Thinking with Eyes and Hands [J]. Knowledge and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 1986 (6): 1-40.

③ 马诺维奇. 新媒体的语言 [M]. 车琳,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 8.

④ 马诺维奇. 新媒体的语言 [M]. 车琳,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 93.

⑤ ROBERTS L. Machine Perception of Three Dimensional Solids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63: 58.

过重构视觉认知的底层规则，正在生成一种全新的环境感知范式。

这种范式转型在当代沉浸式媒介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我们看到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通过触觉反馈与空间音频系统，将用户从物理身体的感知束缚中抽离，使其在数字孪生空间中实现“再物质化”的存在状态。巴西哲学家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对技术图像的经典阐释为此提供了理论注脚，他将摄影设备界定为“技术装置”^①（Apparatus），强调其作为意义生产中介的双重性——既受人类操作者的意图驱动，又通过光学化学过程建构出独立于主体的视觉语法。这种“装置—操作者”的共生关系在自动化时代被彻底重构：当AI“文生图”的代表大模型Stable Diffusion通过潜空间漫步自主生成图像时，人类提示词仅作为初始扰动参数存在，算法黑箱则成为真正的意义生产者。弗卢塞尔预言的“技术图像对线性书写的颠覆”，在此演变为自动化系统对创作主权的技术僭越。同样地，美国历史学教授杰伊（Martin Jay）对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批判，为理解这一转型提供了视觉文化研究的视角。他指出，启蒙运动以来将视觉特权化为“最高贵感官”的做法，实质是理性主义对感知经验的暴力规训。^②而在算法主导的后摄影时代，这种视觉霸权正被机器视觉的“去中心化凝视”解构。美国艺术史学家克拉里（Jonathan Crary）的观察佐证了这一趋势：军事红外成像、医学内窥镜摄影等可视化技术，通过将人类观察者从光学感知链中剥离，实现了“观察者技术化”的认知转型。^③美国著名图像理论学者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则进一步揭示，数字图像对索引性的消解，已使摄影从“现实之镜”沦为“数据之窗”——正如核磁共振影像通过“傅里叶变换”（Fourier Transform）将生物组织转化为频域信号，当代视觉系统正在建构一个由算法定义的本体论框架。^④

美国认知心理学专家约翰斯顿（John Johnston）提出的“解码型感知”^⑤（Decoded Perception）概念，精准概括了这种认知范式的本质特征。在自动驾驶系统的激光雷达点云处理中，在DeepMind（Google旗下人工智能公司）的蛋白质结构预测模型里，视觉信息被解构为机器可操作的数理符号，其意义生成完全遵循算法的内在逻辑。这种“无视觉的视觉”（Sightless Vision）标志着人类感知经验的根本性异化：当Stable Diffusion将“暮色中的孤岛”转化为高维向量时，它不仅在生成图像，还在重构人类对“孤独”的情感认知图谱。美国文学及视觉研究教授汉森（Mark B. N. Hansen）对此发出的警示引人深思：在自动化视觉的统治下，身体已从感知主体退化为情感反应的生物界面，而机器正成为新感知秩序的立法者。^⑥此时，“机器视觉”这一跨学科术语呼之欲出。

在当代关于机器视觉的批判理论谱系中，法国哲学家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视觉机器》（*La Machine de vision*）构成了极具预见性的分析框架。维利里奥通过“知觉后勤学”（Logistics of Perception）这一核心概念揭示了机器视觉从人类生物感知的辅助工具向认知主权者演化的历史进程。在其理论视域下，视觉不再仅仅是笛卡尔主义传统中的“心灵之窗”，而是被重构为技术系统操控的“光学界面”——从望远镜延伸肉眼视距到无人机摄像头替代战地观察，机器视觉通过“速度暴力”（Speed Violence）不断压缩感知的时空连续性，最终将人类推入“实时统治”（Chronopolitics）的认知范式。维利里奥尖锐地指出，这种“无身体的视觉”（Vision Without Body）标志着人类认知系统的根本性异化——我们不再通过具身经验建构世界图景，而是依赖机器视觉生成的“信息表皮”（Informational Epidermis）来确证存在。

维利里奥与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关于技术现实性的论争，进一步凸显了其理

① 弗卢塞尔. 表象的礼赞：媒介现象学 [M]. 周海宁，许凌波，周轩，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229-230.

② 杰伊. 低垂之眼：20世纪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 [J]. 孔锐才，译. 文艺理论研究，2021（5）：156.

③ 克拉里. 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 [M]. 蔡佩君，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49.

④ 米切尔. 重组的眼睛：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 [M]. 刘张铂泷，译. 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7：9-37.

⑤ JOHNSTON J. Machinic Vision [J]. Critical Inquiry, 1999（1）：27.

⑥ HANSEN M. New Philosophy for New Media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96.

论的特异性。不同于鲍德里亚“超真实”（Hyperreality）理论中虚拟对现实的彻底取代，维利里奥的“竞速学”（Dromology）强调物理与虚拟现实在加速度中的辩证共生。正如军事侦察卫星的遥感图像与地面士兵的战术平板构成“混合战场”，TikTok 的美颜滤镜亦不是对肉身的简单遮蔽，而是通过骨骼点追踪算法将生物特征重组为数据化表演。这种“增强型异化”在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媒介物质主义理论中获得呼应。他指出，20 世纪电视技术的普及已使视觉经验碎片化为“信号雪花”^①，而卷积神经网络更将这种碎片化推向极致：社交软件 Instagram 的推荐算法通过边缘检测与风格迁移（Style Transfer），将用户凝视解构为注意力权重的概率分布。两位理论家的共同洞见在于，机器视觉的技术演进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权力的再分配，其终极后果是康德式“先验想象力”被 GPU 并行计算所殖民。于是，在机器视觉建构的自动图像生产秩序中，人类不再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意义上的“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而是沦为拉图尔所述的人类与非人类因素交织的“杂合体”^②（Hybrid）——其身份被拆解为面部识别系统中的特征向量、医疗影像中的组织切片、智能城市监控中的运动轨迹，抑或是社交媒体平台的“步数”。

二、AIGC 作为自动图像： 后人类主义与技术生成的再审视

2022 年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白皮书》指出，“AIGC 既是从内容生产者视角进行分类的一类内容，又是一种内容生产方式，还是用于内容自动化生成的一类技术集合”^③。“自动化”一词在此定义中格外醒目。中国学者吴雨辰认为，人工智能的进化和生成技术正推动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意义上“技术物”的生成。AIGC 图像作为技术物的生成，不仅具备自动化的特点，还带有一定的“非人化”特征。^④也就是说，图像生成不再是艺术家全程参与的主观创造，而是机器基于大量数据和算法自动化生成的结果，这种技术的“非人化”特征正是自动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学者常江提到，数字媒体生态下的“后人类”现象表现为人类经验的计算化，意味着传统的文化和艺术生产被数字化、自动化技术所替代。在这种语境下，AIGC 图像具备了“可计算性”特征，通过数据的分析和计算，AI 可以生成符合要求的图像，不再依赖传统的艺术创作流程。^⑤因此，AIGC 能被视作一种自动图像，是因为它在生成过程中具备高度的自动化、技术驱动性和非人化特征。同时，其生成依赖于机器计算和数据输入，缺乏传统人工创作中的情感与意图，从而实现了图像创作的自动化。

同时，根据德国艺术家法罗基（Harun Farocki）的揭示，自动图像的特质除了“自动化”之外，还在于其作为技术系统的操作界面属性。在此视角下，AIGC 生成的数字图像呈现出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工具理性特征：它们既是技术实践过程的产物，又以确保其提示词任务得以最大化实现为目的。从这一角度看，监控摄像的热成像画面与 AIGC 生成的营销图像具有同构性。前者为救援行动提供生物体征数据，后者为消费行为建模情感参数，二者皆剥离传统图像的美学维度，转化为可量化操作的工作单元。例如，“二战”投射物摄像机通过电视信号建构人机协同作战系统，AIGC 通过生成对抗网络（GAN）构建“创作—传播—反馈”的闭环生态。这种“算法控制过程”产生的视觉材料，正如维利里奥预言的“纯粹信息图表”（Pure Information Graphics），其价值不在于视

① 基特勒. 留声机电影打字机 [M]. 邢春丽,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133-216.

② 拉图尔. 我们从未现代过: 对称性人类学论集 [M]. 刘鹏, 安涅思, 译.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1.

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京东探索研究院.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白皮书 [EB/OL]. (2023-06-05) [2025-07-05]. <https://finance.sina.com.cn/esg/2023-06-05/doc-imywesek8801471.shtml>.

④ 吴雨辰. 人工智能图像生成的技术本质探析: 从西蒙东技术物的生成与进化谈起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4 (12): 4-14.

⑤ 常江. 机器逻辑: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数字媒体生态的自动化演进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6): 107-118, 171.

觉表征本身，而在于作为数据流节点维持系统的再生产。^①当Sora根据用户提示词生成影像时，实质是在执行视觉数据库的拓扑重组操作，其生成逻辑更接近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言伐木工人的“语言—对象”——斧头与树木的接触界面即意义生产的全部场域^②。这种工具理性特征导致双重异化：一方面，AIGC图像作为“元语言贫困化”的产物，通过程序化审美消解个体的创造性凝视；另一方面，其生产机制暗合基特勒揭示的媒介决定性，GPT模型通过潜在空间运算实现的风格迁移，实质是技术无意识对艺术传统的算法殖民。正如法罗基预言的认知转型^③，AIGC生成的残缺语义不再被视为缺陷，反而成为系统自主性的证明——这标志着工具理性对美学判断的终极胜利，也让我们不得不将AIGC视为一种自动图像。对此，学者陈亦水认为：“它（AIGC）既非现实复原的维尔托夫所说的‘电影眼’，也不是曼诺维奇所命名的‘电影笔’，而是或可以称之为拥有自主生成幻觉图像的‘电影脑’（Kino – Brian）。”^④此处的“脑”当然是指基于计算机算法和神经网络模型的生成系统，它能够通过对图像、声音等元素的综合处理来“创造”电影。然而，这种创造并非出自艺术家的直觉或创新，而是基于既定的规则和数据进行的自动化生成。这进一步强化了AIGC作为“自动图像”的结论。但此时，一个疑问便浮出水面：既然“眼睛”和“大脑”都已离开了人类主体，那么在AIGC面前，人类到底还有什么属于自己的？

让我们回到维多利亚时代蒸汽机的轰鸣声中。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在《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描绘了后人类主义的原始场景^⑤，通过伽伐尼电流复活的缝合怪人，既是启蒙理性僭越神权的技术寓言，更是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体界限崩塌的早期症

候。这部1818年问世的人类首部科幻小说，以其惊人的预见性勾勒出“技术人”（Homo Technicus）的认知图式。当基因编辑技术精准剪接生命密码，当马斯克（Elon Reeve Musk）的脑机接口将意识转化为数字信号，雪莱笔下的“人造生命体焦虑”已从文学想象演变为技术现实。这种从有机身体到技术身体的转型，彻底瓦解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自然目的论：自然不再是被观察与征服的客体，而是成为技术重构的“弗兰肯斯坦式怪物”。这一过程既彰显了人类创造力的辉煌，又反噬着人文主义的认知根基。关于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尤其是技术对感知和身份构建的影响，已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一个多元复杂的过程。后人类主义则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构建人类存在的新视角——不仅仅是从生物学和技术层面重新定义人类，而是在技术、社会和文化交织的网络中重新审视人类的意义。

21世纪的技术爆炸加速了人类世（Anthropocene）向技术世（Technocene）的范式迁移。当自动驾驶的激光雷达重构城市感知，AIGC大语言模型重塑知识生产，传统的“人类作为万物尺度”的信条正被解构。这一进程不仅关乎技术实践，而且直指哲学母题：人类究竟是什么？人类与他物的区隔如何界定？后人类主义正是在此语境下兴起，试图统一信息技术革命以来人类研究的理论趋势，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的关系。

后人类主义的核心挑战在于颠覆启蒙人文主义的认知暴力。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中指出，当智能假肢与生物神经实现电化学对话，当实验室培育肉挑战“自然食物”的伦理边界，传统的主体/客体、有机/无机、自然/人工的二元对立已沦为认知考古学的遗迹。^⑥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从本体论层面论证：人类

① PAZETTO D, DE OLIVEIRA R. Between Images and Texts: Vilém Flusser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rt and the Post – Historic Crisis [J]. Art, Media; Journal of Art & Media Studies, 2021 (26): 71 – 79.

② BARTHES R. From Work to Text [M] // HARARI J V.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 – Structuralist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73 – 81.

③ FAROCKI H. War Always Finds a Way [J]. Continent, 2015, 4 (4): 54 – 60.

④ 陈亦水. AI忆术：迈向完整电影神话的AI电影本体论之问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 (7): 100 – 112.

⑤ 雪莱. 弗兰肯斯坦 [M]. 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译委员会, 译. 上海: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5: 1 – 189.

⑥ HARAWAY D.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 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M] //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49 – 181.

主体性不再固着于碳基生物的肉身牢笼，而是与技术形成“共生本体论”的动态网络。^①意大利哲学家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的批判更为尖锐：康德的“先验主体”本质是欧洲白人男性的特权投射，其人类中心主义范式始终与殖民主义、性别压迫共生；当代技术语境下，人类智能的独特性神话正被机器认知所解构。^②美国学者沃尔夫（Cary Wolfe）的论断则更具启示性：“后人类”更准确的定义可能不是“人类之后”，而是“人文主义之后”——它要求彻底放弃将“人类”置于存在论中心的认知暴力。^③

AIGC 图像的生成，正是后人类主义理论锋芒的具身实践。其核心特性在于机器视觉与算法的独立运行能力，这一特性直指后人类主义的核心议题：人类主体与“事物”在认知与存在层面的重叠与转变。AIGC 图像通过数字化处理时间与空间，直接参与对物理现实的再物质化过程，构建了一个技术驱动的新感知领域——一种“后人类凝视”。这种凝视并非将人类降格为技术的附庸，而是体现技术与人类协同进化的关系：二者共同塑造后人类时代的感知与认知方式。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生成”（Technogenesis）概念为此提供了关键视角。技术生成不仅阐释了技术与人类的协同进化，还揭示了后人类主体在这一动态过程中的解构与重塑。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提出的“软机器”（Soft Machine）概念恰可呼应这一观点：人类身体作为多功能的活体系统，是技术与文化共同塑造的流动性集合体。^④ AIGC 图像的生成过程正是如此，通过算法、数据与创作者提示词的协作，将主观意图重新编码为算法规则与机器逻辑的混合结果。这种“认知装配”超越了传统艺术创作的“人类中心论”，将主体性分布在技术与人类的动态网络中。

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瓜塔里

（Félix Guattari）的“无器官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概念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理解：主体性并非先验存在，而是通过机器的欲望生产出的流动性状态。^⑤机器与人类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生产机制，而非单向支配。在根茎状的网络中，技术与人类共同创造出新的主体性与可能性。海尔斯的“赛博格式存在”概念也与此呼应：人类与技术始终是协同进化的，这种后人类状态贯穿于有机与无机、天生与制造、肉身与金属的界限之中。

此外，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⑥也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在AIGC图像的生成中，摄影机、算法模型与观众神经元构成平等的“非人”行动者，共同参与视觉意义的拓扑生成。传统艺术中“创造者/工具”的二分法被彻底消解，视觉意义的生成成为多行动者协同的结果。这种转型不仅挑战了人类的中心地位，更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视觉权力的分配机制：当图像的生成与传播被技术逻辑主导，何者为“看”的主体？何者为“被看”的客体？视觉权力的边界如何在技术与人类的互动中重新划定？

站在迈向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奇点时刻，后人类主义既是对技术狂飙的病理诊断，也是认知范式转型的助产士。它迫使我们在脑机接口的神经脉冲中重思意识的本质，在合成生物的细胞分裂中重构生命的定义。自动图像作为技术生成的典型产物，其意义不仅在于视觉形式的创新，还在于它揭示了后人类时代的核心命题：人类与技术不再是主客对立的二元，而是共生进化的伙伴。这种认知革命要求我们以“共生本体论”重新协商存在契约——不是放弃人类的主体性，而是在与技术的持续协作中，重构主体性的内涵与边界。当AIGC的“机器语言”与人类的“生命经验”在动态网络中交织，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场更深刻的文明转型：从人

① HAYLES N K.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283-291.

② BRAIDOTTI R. The Posthuman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13-150.

③ WOLFE C. What is Posthumanism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10-30.

④ BURROUGHS W S. The Soft Machine: The Restored Text [M]. London: Penguin Modern Classics, 1961: 1-15.

⑤ DELEUZE G, GUATTARI F.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 HURLEY R, SEEM M, LANE H,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2: 1-20.

⑥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0-132.

类中心主义的独白，走向技术与人类共同谱写的复调。

三、迈向后人类图像的 AIGC： 视觉权力的拓扑学重构

在后人类主义语境下，生物政治与技术的结合更加深刻。通过自动化技术，如 AIGC 驱动的自动图像，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生命管理形式：主体被分解为可分析、可操控的数据，身体与视觉被重新物质化为信息。这种技术驱动的生命政治超越了福柯式的纪律社会，通过技术与生物的结合，进一步模糊了人类与技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英国伦敦警察厅于 2019—2020 年在公共场合广泛部署了实时面部识别技术（LFR），甚至在 2024 年利用该备受争议的技术逮捕了 500 多人，这在技术哲学层面构成了监控社会的原始场景（Protoscene）。该技术通过摄像头实时捕捉并分析人群面部生物特征数据，同时与警方数据库比对，从而识别特定个体，以便利伦敦警察的工作。此种生物政治控制的启示性不仅在于其直接将个体生物特征（脸）转化为可实时追踪管理的数字化资产，更在于其预示了后续智能监控系统的空间拓扑学特征——正如维利里奥所指出的，任何感知捕捉控制系统的本质都是相应介质（此处是生物特征数据）的重构。这种原始监控形态与当代 AIGC 生成系统共享着相同的认识论基础，通过可见性生产（Production of Visibility）建立权力关系的物质性网络。

然而，AIGC 驱动的自动图像则大大超越了这一模式。它通过将环境和个体转化为信息流，将监控的权力分散到算法的自动化运行之中，代表了后人类状态下技术与主体性的融合。其不仅是一种视觉记录，还有一种由数据驱动的预测性机制，能够在现实之外模拟和预演可能的场景。这种“后人类凝视”不仅体现了技术对感知的重塑，也揭示了权力的内在变化。传统监控系统的中心化特点正在被一种去中心化的技术逻辑取代，机器

不再需要依赖人类的目光，而是通过自主生成图像参与权力的行使。在这种背景下，视觉的政治性被重新定义，自动图像既重塑了监控的形式，也揭示了后人类状态下主体性和权力机制的深层转型。AIGC 作为一种自动图像，不仅承载着视觉的记录功能，还是权力运行的中介，并进行着延伸与扩展。通过将主体分解为数据、将视觉转化为信息，它参与了监控资本主义的逻辑重构，同时也为理解后人类状态下技术与主体的共生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于是，我们看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笔下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在 AIGC 时代遭遇的双重异化：其环形建筑结构坍塌为卷积神经网络的层级拓扑，而“可见的不可见性”权力机制逆转为“不可见的可见性”认知体制。当 8K 摄像头与图卷积网络（GCN）结合时，监控焦点从人体移动轨迹转向微表情的傅里叶频域特征，生物政治由此进入亚知觉（Subperception）调控领域。这种“神经全景主义”（Neuro-panopticism）的颠覆性在于其建立了自我指涉的控制论循环：系统通过对比生成对抗网络合成的标准行为模板与实时监控数据，自动生成偏离度预警，完全绕过了人类监管者的认知框架。电影《2001 太空漫游》《流浪地球 2》中监控摄像头“凝视”的科幻惊悚寓言，在今天早已变为幽灵般地无所不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所界定的监控资本主义^①在视觉维度呈现独特的生成性悖论：YOLOv5 目标检测算法将人体解构为边界框（Bounding Box）与关键点数据，而 StyleGAN2 生成模型又将离散特征重组为“超真实”影像。这种视觉政治经济学在 TikTok 的美颜算法与深度伪造（Deepfake）的共谋中达到极致，用户通过主动参与自身图像的商品化过程，使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批判的文化工业^②获得了狂飙突进式的升级。值得注意的是，AIGC 在此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其潜空间漫步技术既强化了数据攫取逻辑，又通

① ZUBOFF S.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9: 15.

② HORKHEIMER M, ADORNO T.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3.

过生成对抗网络的涌现性（Emergence）创造出逃逸现有视觉规训的可能路径。

自动图像的生产机制更揭示了技术物的认知立法权。美国生态哲学家莫顿（Timothy Morton）的“超对象”^①（Hyperobject）理论在此获得新解。当 NASA 将黑洞引力透镜数据通过 GAN 模型转化为科普视觉图标时，当 DeepMind 的 AI 模型 AlphaFold 以蛋白质结构动画重塑生物学家的认知图式时，机器视觉已从人类视觉的“延伸”升级为科学事实的建构者。这种本体论层面的权力让渡，使得福柯的“生物权力”概念需要被重新诠释——在诸如智慧城市的行为信用评分系统中，个体的社会行为被实时采集并量化为信用等级的可视化表征，人类主体性由此被重构为算法权重分配的逻辑副产物。

除了生物政治的维度，维利里奥的“速度学”（Dromology）在 AIGC 时代展现出了时空政治的新维度。当 Stable Diffusion 模型将艺术创作从数月的精细雕琢压缩为秒级生成时，其本质是通过算法霸权实施“认知殖民”——传统创作中绵延的沉思时间（Durée）被解构为离散的向量运算，艺术家的苦思冥想和具身经验沦为了潜空间的初始噪声参数。这种时空压缩机制完美印证了维利里奥的预言：技术速度的终极目标不是解放创造力，而是通过“知觉的工业化”将人类纳入永续生产的控制论闭环。例如，好莱坞科幻电影的概念设计流程，已从手工绘制故事板转向 Midjourney 批量生成的场景草图，在创作周期缩短 90% 的同时，却将视觉语法囚禁于算法模型的统计相关性之中。这种“速度暴政”的代价，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珍视的“灵韵”（Aura）在参数优化迭代中彻底消散——当图像生成模型 DALL·E3 在 0.3 秒内生成梵高风格的星夜图时，星空不再是被凝视的崇高客体，而是沦为风格迁移的数据特征组合。正如南加州大学教授克劳福德（Kate Crawford）谈及的，这些数据如同“砖石”或“燃料”，被垒砌和填充进 AIGC 这一“巨构”的“发动机”

中，造成了从“人类主体”到“数据主体”的转变。^②

而在维利里奥的“知觉后勤”框架下，AIGC 既是认知危机的制造者，也成为技术补救方案的提供者，形成了异化与补偿的双重辩证关系。当 TikTok 用户通过 AI 滤镜将自拍实时转换为波普艺术肖像时，他们正实践着德勒兹所述的“控制社会”生存策略——通过将个体感知主动接入算法系统，换取对速度社会的适应性。这种“知觉代偿”机制在神经美学层面获得印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脑成像实验表明，AI 生成的超现实场景能触发人脑默认模式网络（DMN）更强烈的激活，其神经效应甚至超越现实景观。然而，这种技术赋能的背后是残酷的认知交易。流媒体平台 Netflix 的算法推荐系统通过 A/B 测试不断优化用户注意力曲线，最终将影视作品观赏降维为多巴胺分泌的刺激—反应链。维利里奥警示的“认知外包”（Cognitive Outsourcing）在此达到极致——当人类将色彩偏好委托给色彩系统科技公司 Pantone 的 AI 预测模型、将构图美学托付给视觉传播平台 Canva 的自动排版工具时，艺术创作便沦为海德格尔批判的“技术座架”^③（Gestell）的奴役对象。

不难发现，Stable Diffusion 生成的《蒙娜丽莎》变体虽完美复现了达·芬奇的晕涂法（Sfumato），却因缺乏文艺复兴作坊的集体仪式感而沦为一种“完美的赝品”。这种“无起源的图像”彻底消解了本雅明的“原真性”（Echtheit）概念，正如 NFT 艺术平台上的 AI 生成作品，其价值不再根植于创作过程的历史性，而是取决于区块链哈希值（又称散列值、杂凑值或消息摘要）的唯一性。更值得警惕的是，AIGC 正在生产一种新型的“数字幽灵”。谷歌的 Imagen 模型通过文本反演（Textual Inversion）技术，能将已故画家的风格从有限的真迹中提取并无限衍生，使得诸如蒙德里安（Mondrian）的冷抽象或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伤痛叙事沦为

① MORTON T. 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1.

② 克劳福德. 技术之外：社会联结中的人工智能 [M]. 北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24：42-51.

③ HEIDEGGER M.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J]. Technology and values: Essential readings, 1954 (99): 20.

可批量定制的视觉模板。这种“技术招魂术”不仅挑战了艺术史的时间线性，更暴露了后人类时代记忆政治的伦理黑洞。对此，中国学者吴琼以德里达式的口吻评价道：“视觉机器既是一种幽灵机器，也是一种生产幽灵的机器。它凝定主体的欲望，可又让主体在满足后陷入更大的虚空；它为主体提供一个又一个的幻形，并最终也把主体自身彻底变成幻影。”^①

用电影美学所受到的冲击来举例可能更为形象。传统电影语言依赖的“凝视辩证法”，如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的男性凝视理论，正在被机器视觉的“无意识凝视”解构。这迫使我们必须重思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的“电影本体论”——当影像的索引性被 Stable Diffusion 的潜空间取代，电影的现实锚定点是否已迁移至算法的统计相关性之中？维利里奥的理论警示我们，在技术加速主义的狂欢背后，潜藏着认知贫困化的危机。当机器视觉的“完美图像”充斥银幕时，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所追寻的“雕刻时光”可能永远迷失在参数优化的迭代循环里。

机器视觉与算法生成的操作性图像，本质上构成了后人类主义研究的认知界面。这种“自动化凝视”既非科幻想象的未来投射，也非简单的工具延伸，而是海尔斯所言的“非自然认知”（Unnatural Cognition）的物质化实践——当监控摄像头的机械眼在纪录电影《你的脸》中以固定机位凝视衰老的面容时，当实验电影《利维坦》借助无人机视觉生成深海生物的算法拟像时，电影媒介的“凝视辩证法”已被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后人类主体性不再栖居于生物视觉的肉身之窗，而是弥散于机器视觉的拓扑网络之中。正如美国学者布朗（William Brown）对“电影灭绝”^②（Extinction of Cinema）的诊断，当 TikTok 的 AI 剪辑工具将用户自拍自动转译为波普风格的短视频时，传统电影的时空连续性正被算法的碎

片化逻辑取代，巴赞的“木乃伊情结”在此异化为数字幽灵的永生执念。弗卢塞尔曾将摄影术界定为“第二级抽象”，即对文字抽象现实的再度抽象。而 AIGC 图/影像无疑构成了“第三级抽象”，它们不再指向物理世界的痕迹（如银盐颗粒），而是对已有数字图像库进行递归式重编码。这种抽象层级的跃迁引发了一场美学地震，传统电影语言范式在此崩解为各种参数。这也印证了罗兰·巴特的预判，当图像生产完全自动化时，“作者之死”将升维为“媒介本体之死”——电影的“刺点”（Punctum）不再来自现实世界的偶然馈赠，而是算法失控的熵增表演。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 AIGC 引发的视觉权力重组实际上在福柯的“生物政治”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之间展开了激烈博弈。一方面，普通用户通过 Midjourney 获得前所未有的视觉表达权，如 Instagram 上的业余创作者能以算法辅助突破专业美学壁垒；另一方面，OpenAI 等科技巨头通过模型权重（Model Weights）的控制，悄然成为新视觉秩序的立法者——其内容审核系统实质是硅谷价值观的全球化输出。于是，AIGC 最终将我们引向的是一个存在主义困境，其既是人类突破生物认知极限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也是加速异化的技术铁笼。于此，中国学者曾军援引“什克洛夫斯基之问”揭示了 AIGC 时代的症候性，“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艺创新的目标在于克服感知的自动化”^③。在 AIGC 图像中，自动化的核心逻辑可能导致图像创作走向模板化，即本文所述的“自动图像化”，这正是“陌生化”理论所警示的创作惯性问题。要想破解这一困境，我们或许需要重拾斯蒂格勒的“药理学”^④（Pharmacology）视角——AIGC 技术既是毒药，也是解药之源。在社交软件 Discord 社区的 AI 艺术合作社中，创作者可以故意设置模糊不清的提示词或加入算法的随机性，即通过非理性和潜意识的驱动，打破技术自动化带来的单一性，甚至可以通过故意植入对抗性提示词（如“让算

① 吴琼. 视觉批判导论 [M]. 重庆: 西南大学出版社, 2022: 256.

② BROWN W. Man Without a Movie Camera—Movies Without Men: Towards A Posthumanist Cinema? [M] //BUCKLAND W. Film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Hollywood Movies. Oxon: Routledge, 2009: 66–86.

③ 曾军. 电影“自动机制”的再思考: 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论问题 [J]. 电影艺术, 2025 (1): 34–40.

④ STIEGLER B.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On Pharmacology [M]. ROSS D,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37.

法崩溃”的指令)，迫使 Stable Diffusion 生成不可预知的畸变图像。这些“故障美学”（Glitch Aesthetics）的实践者，正以技术自身的混乱性为武器，在算法霸权中凿出自由的裂隙。当机器视觉的“完美暴政”遭遇人类意图的“理性失控”，或许正是迈向后人类图像的契机，也是后人类灵韵重新诞生的时刻。

结 语

AIGC 作为“自动图像”的崛起，不仅标志着图像生产范式的技术性迭代，还揭示了后人类语境下认知秩序与主体性的深层重构。必须提及的是，当我们将 AIGC 论证为一种自动图像时，我们所得到的并不是某种技术解放的宣言，相反，结论在相当程度上饱含着批判性与忧思。正如曾军所指出的，“自动化”这一定义突出了技术的效率性与自主性，但同时也隐含着对“技术失控”或“去人性化”潜在风险的隐忧。^① 未来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拓展跨学科视野，如在技术哲学视域下 AIGC 如何重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在世存在”？在社会学领域，自动图像又将对劳动形

态、文化消费与集体记忆产生何种冲击？在伦理学维度，全球南方国家在技术殖民中的边缘化危机——当硅谷的价值观通过 Stable Diffusion 的默认风格向全球输出时，本土美学传统是否面临着新一轮的文化消音？这些追问要求我们放弃对“纯粹技术”的迷恋，转而审视 AIGC 嵌入社会关系的复杂网络。

正如《弗兰肯斯坦》中科学家的悲剧并非源自弱小，而是源自傲慢。当代技术文明若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应当在后人类主义的视角下，勇敢面对那个终极诘问：当人类亲手拆解了区分“我们”与“它们”的认知藩篱，我们将以何种伦理姿态与技术共生体共舞于“后人类世”的舞台？当 Sora 生成的虚拟海鸥与真实候鸟共享天际线，人类的使命或许不再是追问“何为真实”，而是学会在算法的混沌中，以谦卑之姿守护那些无法被量化的生命诗性——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哀悼灵韵的消逝，“后人类世”的价值锚点，终将存在于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永恒张力之中。

（责任编辑 张欣琳）

AIGC as “Automatic Image”: A Posthuman Perspective

Zhang Zongwei, Zhang Shinu

Abstract: As a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the ri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marks a paradigm shift in image production from an anthropocentric to a technology-driven model. Through algorithmic black boxes and latent space navigation, AIGC detaches image generation from human creative intent, forming an automated and dehumanized “machine language”. Tracing the intellectual and media lineage from photography to machine vision, we find that from a posthuman perspective, AIGC as a form of “automatic image” reconstructs subjectivity, technological ethics, and visual power. AIGC not only dissolves the indexicality and authenticity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images but also reshapes the perceptual order through “violence of speed” and a “posthuman gaze”. In the “Posthuman Ag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reestablish an ethical framework for human-machine coexistence to confront the crises of technological transgression and cognitive impoverishment in this automated era.

Keywords: AIGC, automatic image, machine vision, posthumanism,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bout the authors: Zhang Zongwei,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Theater,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Zhang Shinu, Research Assistant at the School of Theater,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① 曾军. 电影“自动机制”的再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论问题 [J]. 电影艺术, 2025 (1): 34-40.